

语法修辞论集

YUFA XIUCI LUNJI

李晋荃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YUFA XIUCI LUNJI

语法修辞论集

李晋荃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074号

YUFA XIUCI LUNJI
语法修辞论集

李晋荃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苏州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219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5.20元

ISBN 7-80006-734-3/H·157

序

我喜欢读李晋荃同志的论文，常常从他的论文中得到启迪；我也乐于向同行学者介绍他的论文集，我想读者必定会得到不少的收获。

李晋荃同志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容易被忽视而实际上值得探讨的。这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们对某些语言现象只注意到事实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经他一分析，人们对问题便有更深入的理解。例如同形异构现象，这是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的。由于结构层次不同而使意义发生差别的同形异构，更有不少论文都曾加以分析。可是对语句作不同的切分，意义是不是一定会改变呢？只要读一读《多切分名词性偏正短语》这篇文章，就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并且会知道这当中有规律可寻。另一种情况是语言学界有某种流行的说法，人们深信不疑。李晋荃同志从实际出发，收集了大量例证，条分缕析，令人信服。例如人们大都认为名词直接修饰动词是古汉语的语法特点；至于现代汉语，除了时地名词之外，名词是不直接修饰动词的。“火烧赤壁”、“水淹七军”，这是古汉语的遗留说法，“历史地观察”、“逻辑地思考”，当中的“地”不可少，不算“直接修饰”。这种说法可靠不可靠？只要读一读《试论非时地名词充当状语》这篇文章，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你会坚信名词直接修饰动词是古今一脉相承的用法。

当然，我并不是说李晋荃同志的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结论都是颠扑不破的。不过，他的每篇文章都有新意，都能启发我们思考问题，都能打破某些成见，这是有目共赏的。

李晋荃同志的论文给人以启发，不只是在具体问题上，也表现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研究汉语语法，学者大都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大体有这么三种情况。一是用汉语句子作为例证，去说明某种西方语法理论（例如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这实际上是借汉语作例，用以证明西方某种语法理论的概括性。并未描写汉语语法规律，也没有解释汉语语法现象。另一种是用西方分析语句的方法来分析汉语，由于汉语的结构与西方语言毕竟不同，在分析中不免削足适履。虽然也说明了一些汉语规律，但是要做到自圆其说颇不容易。还有一种情况是立足汉语，借用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拘一格，目的是为了了解汉语的实际问题。从李晋荃同志的论文集中前几篇文章看来，他采取的正是后一种方式，所以卓有成效。

文章可以比作导游，它引导你去观赏美景，去发现新天地。可是有些导游先让你攀越险阻，费尽精力，然后才到达目的地。这样的文章我虽然也耐心地阅读，可是绝不推荐。读李晋荃同志的文章，始终赏心悦目，读者一定会有同感。

张 斌

1993年春于上海师大

目 录

语法观念的更新:

关于80年代中国语法学大变革的思考·····	(1)
现代汉语析句法的发展·····	(12)
句子结构的语用安排·····	(23)
句法成分的话题化·····	(36)
话题连贯和述题连贯·····	(49)

试论非时地名词充当状语·····	(62)
------------------	--------

动词前面不是宾语的位置

——试谈“前置宾语”问题·····	(75)
多切分名词性偏正短语·····	(85)
“像”的词性与词的归类·····	(92)
固定格式“从A到B”的意义、功能和结构·····	(100)

“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是修辞的要求吗

——兼谈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114)
言语歧义与言语表达的不确定性·····	(124)
上义词语和下义词语的选择与配合·····	(136)
人际关系与称呼语·····	(147)
辞格组合体系试探·····	(160)
80年代江苏省修辞研究述评·····	(172)

现代汉语语法学词类体系对照·····	(181)
现代汉语主谓句句型·····	(203)

〔附〕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语法学和修辞学·····	(225)
三个平面：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	(246)
《实用汉语语法学大辞典》(选录)·····	(263)

语法观念的更新：关于80年代 中国语法学大变革的思考

从科学自身的发展来说，观念更新是科学发展的火车头，具有指引科学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和带动科学飞速前进的巨大威力。80年代中国的语法学空前繁荣，正是由于中国语法学界语法观念的更新，才带来这兴旺发达的局面。这是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大变革，对汉语语法学今后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80年代中国语法学最大的转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美国描写语法学深入人心。在这种影响之下，描写观念成为汉语语法学界广泛流行的新观念，描写语法取代了传统语法的主导地位。

从《马氏文通》算起，传统语法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影响既深又广。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至迟在30年代就已开始传入中国，但反响不大。50年代，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问世，汉语语法研究受到美国描写语法的巨大冲击。60年代初，吕叔湘、朱德熙、方光焘等先生陆续发表《说“的”》、《说“自由”和“粘着”》、《句法结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论语言记号的同一性》等重要论文，汉语语法学显露出变革的生机。但是，一场历时10年的政治风暴扼断了这个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势头，传统语法仍然雄踞统

治地位。这种形势直到80年代才根本改观。据施关淦先生统计,80年代《中国语文》平均每年发表现代汉语语法论文十七八篇,按性质大致可分作三类,第一类是语法理论的研究,多半是讨论析句法的,其中论述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属于描写语法学;第二类是对语法事实和规律的描写,数量约占语法论文的一半以上;第三类介乎前两类之间,既有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又有语法事实的研究,大都也或多或少地采用、吸收了描写语法的方法。①我们从《中国语文》这个窗口不难看出,80年代的中国语法学,主流已不再是传统语法,而是结构主义的描写语法。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语文》上的几次小争论:关于“贵宾们所到之处……”,关于“主语能不能放在介词结构当中”,关于“从……到……”。这些争论尽管并未充分展开,而且还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语法的规范观念的束缚,但毕竟多数文章都强调了语法事实的客观性。不论写文章的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讨论实际上是启发人们怀疑传统语法的规定性原则,客观上起了引导人们走描写语法道路的作用。

美国描写语言学明确表示:“语言是人们说话的方式,而不是某些人认为应当怎样说的方式”。②语法学应该从实际语言材料出发,客观地描写语法事实,发现其中的规律。这种描写观念在80年代迅速为广大汉语语法研究者普遍接受,美国描写语法学的一套方法和术语,如替换分析、分布分析、对比分析、直接成分分析、扩展、空位……也被广泛吸收、使用。这种新的描写观念及描写方法给中国语法学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气,促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动词研究、副词研究、短语研究、句型研究、歧义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进展,还开辟了口语研究这一重要新领域。汉语语法学摆脱了传统语法的危机,大踏步前进,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展示描写观念的科学价值。汉语语法有大量的调查任务,今后,描写观念还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对于多数研究者来说,描写观念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流行开

的。它的影响如同霏霏春雨，“润物细无声”。而源于结构主义的层次观念及来自描写语法学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则经过汉语析句方法的大讨论，在大喊大叫中使人们普遍自觉地接受的。

《中国语文》发起并组织了现代汉语析句方法的讨论，从1981年第2期至1982年第3期，共发表讨论文章18篇，后来再加上未曾发表的8篇，编为《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其他刊物，也发表了若干有关文章。讨论的中心是评价传统语法的成分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和描写语法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两者的是非优劣，探讨更有效的汉语析句方法。这次讨论的直接成果，是无论赞成结构主义还是坚持传统语法，在承认语法结构的层次性这一基本点上各方认同，语法学界广泛地树立起层次观念。于是，不分层次的成分分析法终于普遍地为各种分析层次的析句方法所取代。尽管这些析句方法还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都吸收了描写语法的直接成分分析法，都重视语法结构的层次性。不但在单句分析中，而且在构词法、多重复句和句群的分析中，都进行层次分析。1982年，吴竞存、侯学超先生的《现代汉语句法分析》出版，这部专著明确提出了层次分析的三原则，对现代汉语句法结构层次进行了较全面的描写，它表明汉语语法的层次分析已经成熟，对层次分析法的推广、普及和深入研究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由于树立了层次观念并探讨了层次分析的方法，过去传统语法不讲层次而引起的许多混淆不清的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例如，对于“祥林嫂死了当家人”之类语句，“祥林嫂”在第一层次中的主语身分可以得到确认；对于“别说|了”、“别喝|了”与“别|病了”、“别|喝了”之类层次差异，可以得到简明的解说；对于“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的墓”和“*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墓”之类正误之别，可以方便地给予区分。③层次观念标志着语法研究从原子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变，使人们深入认识语法结构的本质特性；汉语语法学不但增强了科学性，而且为今

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

二

80年代中国语法学更为深刻的转变，是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观念的诞生。三个平面的观念扩大了语法的内涵，有人称之为广义语法，与之相对的是只讲句法平面的狭义语法。广义语法的三个平面观念，可以胡裕树、张斌先生的学说为代表。

胡裕树、张斌先生在70年代末就已孕育熔语言学各派学说于一炉又切合汉语特点的语法思想。从80年代初开始，连续发表《句子分析漫谈》、《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句子的解释因素》等重要论文，提出了三个平面的学说。这个学说主张：（1）“语序所表达的，有的属于语义，有的属于句法，有的属于语用。”例如：“客人来了”与“来客人了”是句法的变化。

“我看你”与“你看我”是语义的变化。“你真好！”与“真好，你！”则是语用的变化。（2）“虚词的作用也有语义的、句法的、语用的区别。”例如，“读书”与“读的书”、“学生的家长”与“学生和家”，是虚词改变了句法关系；“我把他批评了”与“我被他批评了”，是虚词改变了语义关系，“把”指明受事，“被”指明施事；“关于”、“至于”之类，则是虚词点明话题，属于语用的范围。（3）“句法分析是句子分析的基础。”然而“句法分析并不是自足的”，“如果不能根据（句法）分析的结果，进一步了解句子中的语义关系，那就不能算达到了析句的目的”。“至于语用方面的内容，更须加以分辨，否则会出现以混同代替区别的情况，必将影响对句子意义的精确理解。”（4）句法、语义、语用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过去语法分析“没有把句法分析与语义分析、语用分析很好地联系起来，应该说是个缺点”。“语义关系和句法关系常常联系在一起，但是情况并不十分简单。比方说，主语与施事、宾语与受事，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④

这个学说的影响与日俱增，大大推动了汉语句法语义的研究。句法语义的研究不始于三个平面的学说，进行句法语义分析也并非全都导源于三个平面学说，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作为一个崭新的语法观念，三个平面的学说对于句法语义（及语用）的研究无疑是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80年代句法语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语义特征、语义指向、语义关系诸方面都有飞速的发展。语义特征的分析是朱德熙先生60年代的一大贡献（《句法结构》，1962年）。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继续发展，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陆俭明先生的《“V来了”试析》，论析同为“V来了”的“同意来了”、“以为来了”、“休息来了”、“走来来了”等结构层次、结构关系不同，其原因取决于V（动词）的不同语义特征和“来”本身的语义特征。⑤这是一项富有新意的成果。语义指向的分析是80年代汉语语法分析的新突破，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不少，成果丰富，颇多新见。例如，“他吃光了饭”与“他吃饱了饭”，在句法平面上是同样的结构，而在语义平面上，“光”的语义指向“饭”，“饱”的语义指向“他”，因而前者可以变换为“他把饭吃光了”，后者不能变换为“*他把饭吃饱了”。这就深入揭示了两者的不同，超越了以往的句型分析。语义关系的分析是个老题目，但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更深入、更广泛，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但用于区别“鸡不吃了”之类多义语句，而且用于研究句式变换等；不但注意直接成分的语义关系，还重视间接成分的语义关系；不但研究动名关系，还探讨名名组合等。视野开阔，新见迭出。例如，“张师傅炒肉丝”，不能变换为“*肉丝炒张师傅”，“青椒炒肉丝”却可以变换为“肉丝炒青椒”，区别在于“张师傅”和“青椒”两者与“炒”的语义关系不同。再如，笔者提出：“优秀农村教师”、“丝绸衬衫质量”等之所以不构成多切分结构，“江南农村教师”、“第二服装厂衬衫质

量”等之所以成为多切分结构，其制约条件是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③总之，句法语义的研究在三个平面观念的推动下成了80年代汉语语法学的热门课题，大大深化了汉语语法的研究。

把语目引进语法领域，也在三个平面学说的推动下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了初步成绩。例如，借助“话题”来确立话题主语，并进而阐明主谓谓语句的生成是与之平行的句式话题化的结果，借助“预设”说明递进句、转折句等的实质和规律，借助“语境”进行语法分析，^⑦都别具一格，使语法分析更加深入。

三个平面观念的重要意义不仅于此，它的重大价值更在于推进形式与意义相结合这一原则的深入研究。传统语法不区别三个平面，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混杂不清，例如，把主语与施事、宾语与受事混为一谈，其实，主语、宾语是句法平面上的概念，施事，受事属于语义平面。只有区别三个平面，才能避免这类不同平面的内容的夹杂纠缠，正确贯彻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结构主义语法只研究句法平面，而且把目光集中在形式上，不重视甚至回避意义问题，当然也谈不上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有人批评直接成分分析法不能区别“我打他”同“他打我”^⑧，中肯地指出了结构主义语法的局限性。在句法平面上，这两例只能算是一个语符序列“SP(VO)”，只不过其中的S、O代入了不同的具体词项而已。对于这种句法结构相同而语义不同的语句，也必须把不同平面区别开来并联系起来，才能使形式和意义统一。三个平面的观念澄清了传统语法的迷乱，冲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给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推动对这个重要原则的研究更加深入，对于汉语语法学的科学化、现代化具有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

三

80年代中国语法学另一方面的重要转变，是大语法观念崭露

头角。所谓大语法，是指语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而产生的新兴边缘学科。如果说三个平面观念主要是向深度开掘，那么大语法观念则侧重于向广度开拓。

索绪尔提出“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主张，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强调“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排除出去。”^⑨这对于纯化语言学的对象，促进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迅速发展，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贡献。索绪尔并不否定外部语言学的重要性，他所说的外部语言学的内容，正是今天某些新兴边缘学科感兴趣的研究题目。但是，在索绪尔的主张影响之下，语言学却被封闭在一个孤立的狭窄范围之内，语法研究割断了语言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的有机联系。现在，这种语法研究被视为微观的研究，称作“纯语法”；而从新兴边缘学科的视角进行语法研究被视为宏观的研究，称作“大语法”。“大语法”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索绪尔的“外部语言学”的范围。

新兴边缘学科的涌现，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股宏大浪潮。在这股世界新潮中，语言学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文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如雨后春笋，接连破土而出，新学科、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在80年代大量涌进中国语法学界，培育了新的大语法观念。有人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可能补语，研究状语的分类和多项状语的顺序，研究“把字句”等，有人从计算机语言的角度研究汉语语句的表层结构和里层结构，有人借助认知心理学的成果把汉语的句子切分为最多不超过 7 ± 2 个板块，有人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探索汉语的词与非词问题，有人从语言运用中寻求语法规律……^⑩，80年代的这些成果五彩缤纷，百花齐放，使中国语法学面貌一新，别开生面。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看，大语法恐怕不能算是语法学的正宗，而且它的各个分支学科大都还只是初见端倪，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但是它更能适应社会多方面的实际需要，与众多相关学科发

生了广泛的交流，跟纯语法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它的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有助于纯语法研究的深入。因此，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正方兴未艾，阔步猛进。可以相信，大语法观念的影响将继续扩大、增强，大语法的茁壮成长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学的更加繁荣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四

80年代中国语法观念更新的深刻程度和广泛程度都是中国语法学史前所未有的。除了上述诸观念外，还有不少新观念，像动态的观念、生成的观念、解释的观念、动词“价”（一称“向”）的观念等，也都很有价值。有些原有观念到80年代又在新的意义上被重新提出来，实质也是一种更新。不过这些观念还不及上文所述的几种新观念那样影响大，限于篇幅，不能尽述。这里我们觉得尤其需要思考的是，如此空前深刻而广泛的语法观念更新，为什么会在80年代发生？除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背景因素不论，汉语语法学的发展为这一更新提供了怎样的现实条件？这个大变革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有益的经验教训？下面，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想法。

首先，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了大变革的迫切要求。汉语语法学历来以传统语法为主流。传统语法源远流长，成果丰富。汉语传统语法历经数十年，基础深厚，影响很大，虽然一再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挑战，仍然维持着自己的主导地位。但是，传统语法称不上具有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不够严密，概念往往含糊不清，许多说法甚至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经不起推敲、追究。它重书面语而轻口语，对于书面语也只分析那些规规矩矩、四平八稳的“典型”词句，而且它来自印欧语语法，不能完全切合汉语语法的特点。中国的语法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发现传统语法的种种缺陷。从30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到50年代的词类问题、主宾语问题的讨论，一再为克服这些缺陷努力

革新。这些讨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收获,而最大的收获是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语法的局限性。随着认识的提高,随着不断调查语法事实,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深刻的认识到:传统语法的分析能力有限,在传统语法的范围里兜圈子,不能根本解决汉语语法问题。到了80年代,中国语法学界终于普遍醒悟了。人们不再囿于传统的束缚,而是发扬革新传统,多方吸收现代语言学新知识,积极探索新路。面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面对汉语语法学大变革的要求,许多老一辈学者带头革新,大批中年人奋发进取,年青一代勇往直前,开创了80年代深刻而广泛的大变革局面。大变革是汉语语法学发展的历史要求,而革新精神为达到这个要求提供了现实条件。

其次,是世界语言学的发展促进了汉语语法学的大变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起,描写语言学风靡世界,接着生成语法学震动环球,许多新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层出不穷。这些现代语言学的新学说在80年代大量涌入中国,刺激了中国语法学的变革,又供给这一变革以丰富的养料。中国语法学认真反思,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良传统:借鉴各种语法理论和方法,熔各家之说于一炉,“力求发现汉语结构的特点,不断革新语法体系”,既“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又“立足革新、不断探索”。^①汉语语法学从开始建立直到现在,一直受到国外语言学的强烈影响,但是决不机械照搬照套。《马氏文通》并非拉丁语法的简单仿造,《新著国语文法》也不是英语语法的中文翻版。诚然,这些初创时期的汉语语法学体系不免有较多的模仿痕迹,但就是在那时,中国有识之士即已明确提出了反对一味模仿的主张,所以纯粹模仿的汉语语法著作没有取得立足之地。其后陈望道、方光焘、王力、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张斌诸前辈学者的汉语语法研究,都是重视汉语语法的特点,重视借鉴、吸收国外各家学说,不拘一格,努力发展切合汉语实际的语法学说。80年代,多彩的国外新学说为中国语法观念的更新提供了足资借鉴的丰富材料,

正是在这些学说的影响下，才产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三个平面的学说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科学无国界。发扬汉语语法学的好传统，勇于借鉴，善于吸收，是汉语语法学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条件，任何否定这一点的说法、做法都不足为训。国外语言学许多更新的理论和方法正源源不断被介绍过来，中国的语法观念还将继续进一步更新。

再次，理论水平的提高对大变革起了正确指导和切实保证的作用。理论研究和用例研究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理论和方法产生于用例调查的基础上，而用例调查又需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采用适当的方法。汉语语法学历史不长，传统语法忽视理论，汉语语法学用例调查还很不够，理论研究更是薄弱。由于理论研究薄弱，用例调查的新进展常常会引起一番争论，而就事论事的争论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依赖于理论研究的发展，50年代词类问题的讨论和主宾语问题的讨论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这个道理。80年代的析句法讨论也是这样。当许多文章列举用例来争辩两种析句方法的是非时，朱德熙先生指出：“所有自然语言的语法构造都是有层次的，层次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既然如此，进行语法分析就不能不进行层次分析，层次分析是语法分析的一部分，是进行语法分析不可缺少的手续之一。不是一种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的方法。”^⑫这一精辟见解从理论上为树立层次观念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林祥楣先生又以深入的理论分析阐明：传统语法的“中心词分析法的手续是搞心，目的是定（句子）成分，而它的原则是词和句子成分相对应。”布龙菲尔德的描写语法是一个“功能体系”，两者相互对立，是“两种不同的语法思想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汉语的语法分析，不免都有片面性。”^⑬这就从根本上廓清了两种析句方法的实质区别，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继承与借鉴，探讨建立兼顾层次、功能、关系的语法分析方法。这说明，汉语语法学的理论水平确是提高了。没有这样精深的理论探讨，80年代的大变革不可能达到空前深刻而广泛的地步。这是一